

洛阳“一元电影模式”尴尬谢幕调查

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图

核心提示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早在3年前在农民工集中的工地创建了全省首个“农民工一元电影俱乐部”,用健康向上的影视作品占领了农民工业余生活阵地,给业余生活匮乏、单调的外来务工人员送来了精神文化套餐。然而,好景不长。最近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爆出因市场不景气,“一元电影”已经退出了市场,改走其他发展路子。公司10余台胶片放映设备、1000余部电影拷贝只能静躺在库房一隅,“英雄无用武之地”。

昔日热闹非凡的“一元电影”缘何会退出市场呢?“洛阳模式”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一元电影”在公益与商业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尴尬呢?

文化生活匮乏的农民工

“下班没事干,就去‘一元电影俱乐部’转一转”。这句顺口溜是当年在洛阳市打工的农民工自己编的,也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谈起当初看“一元电影”时的情景,张小伟记忆犹新。几年前洛龙区进行大规模建设,他和同村邻居从嵩县老家赶到这里进入工地打工。虽然一个月只有不足千元的收入,但这让张小伟非常欣喜,因为只要好好地干一年下来,也有个万把块钱的收入。工地上的活虽然很累,可难不倒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汉子,但夜的孤独却让他无法排遣。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任何娱乐可以消遣的农民工们长期被寂寞和空虚压抑着。他们有

一大部分开始涌向路边的小摊边三五成群地喝酒,用酒精来代替娱乐,麻痹空虚的心灵。饱受文化饥渴之苦的外来务工人员享受不到起码的文化生活,以致为数不少的人因业余时间无法打发而感到无聊,有些人甚至误入歧途,沉溺于赌博、酗酒、看黄色录像,滋生了社会治安隐患。

农民工们业余生活的匮乏、单调使他们走向了偏离社会轨迹的道路上。该事件引起了当地新闻媒体的关注,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引起了众多人士的关注。

“一元电影”的辉煌岁月

“一元电影”就是在这种纷乱复杂的情况下诞生的。首创“一元电影”模式的人是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王宝生。谈起当初创办“一元电影”的情景,王宝生显得格外激动。他说:“新区建设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5万余名农民工,他们白天为城市建设出力,晚上却无事可做。我们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到各工地进行调查,与工地协调场地及用电,并制订为农民工义务放映电影的计划”。

第一次在工地上免费放映电影的情景,王宝生记得很清楚:那是12月份的一个晚上,他们组织人员在龙富小区工地的空地上架起两根铁管,挂起银幕,当晚开演时,吸引来了500余名农民工。

还有一次公映,吸引来2000多名农民工。“黑压压的,全是人,那场面特别壮观。”王宝生说,他已经好些年没见过那么多人看电影了。如何让农民工能在室内场所看电影?公司租了一个农贸市场的大棚,每人收取0.5元钱,开始尝试有偿服务。

2006年6月份,洛龙区文化局和电影公司正式在古城乡焦屯村一处工地上搭起了帐篷,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民工电影俱乐部。俱乐部每晚放两部电影,收费1元,并购置了凳子,实现了“从露天看到篷内看,从站着看到坐着看”的目标。电影收费后,来观看的农民工数量并没有减少,平均每晚都能达到150人。随即,他们又在古城村组建了第二个农民工电影俱乐部,

之后,位于魏东村、马圪土当村的农民工“一元电影俱乐部”也先后成立。

伴随着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逐渐告别了孤独苦闷的生活,走进了“一元电影”大帐篷里看电影。这不但是消磨孤独夜夜的好办法,也是一种快乐的娱乐方式。一时间,王宝生的“一元电影”名气大增,新闻媒体的记者也不断光临他的电影大棚,对这一做法纷纷报道。回忆起那段时光,王宝生感慨颇多。他说:“那时候整天都是忙,几乎就没闲的时候”。

作为洛阳市硕果仅存的一家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这个只有11名员工的小单位长期承担着为区内农业人口和部分流动人口放映露天电影、丰富业余生活的重任。为填补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空白,洛龙区文化局和区电影公司发起了“送电影慰问新区农民工”活动,在古城村等建筑工地上免费放映露天电影。媒体的大量报道,引起了国家及省市相关部门的重视。2005年8月,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捧回了“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先进集体”奖牌。那一年,河南全省获此殊荣的仅有4家单位。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有关负责人到洛阳实地调研后,充分肯定了该市的做法,并奖励洛龙区电影公司3套放映机和1个电影放映大棚。国家广电总局领导专程带队到洛阳市进行调研,认为“农民工一元电影俱乐部”针对性强,对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繁荣农村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国家广电总局领导表示,“农民工一元电影俱乐部”为解决农民工看电影难、活跃文化市场、打造文化河南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可以作为“洛阳模式”,总结经验在全国推广。

“一元电影”向左还是向右?

“一元电影”在全国各地的不断推广,让那些曾经在夜晚来临时备受苦闷煎熬的外来务工人员感受到了文化娱乐所带来的快乐。但是在那些务工人员幸福微笑的背后,“一元电影”却是另一种复杂表情。

据王宝生介绍,“一元电影”不但票价低廉,而且也给来城市务工人员的人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化娱乐去处,让他们在快乐中接受文化的熏陶。

但这种看似有效的运营模式,也让王宝生产生了困惑。首先是如何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营,因为职工要吃饭,没钱怎么办?总不能饿着肚子去干工作吧。因为票价低廉,扣除各项开支,每晚上映一场电影也赚不到几个钱,

可是为了让那些务工兄弟们能够有个好的去处,能够排遣他们的孤独、空虚心灵,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支撑。

让王宝生更苦恼的是,由于使用的是16毫米胶片机,放映的画面质量差,声效效果也很差。放来放去都是一些老片子,虽然库存1000多部老片子,可每天晚上放两部,时间长了,来看的人都腻了,逐渐人数减少了很多。自创办“一元电影”以来库存的片子放了个遍,还不能解决问题。与周围的电影公司交流片子,换来换去还是些“旧面孔”。外租片子贵,贵也要租,尽量保证每月有两部新的好片子。买新的影片,一个拷贝两年前是1500元,现在涨到了2500元;而且许多电影制片厂主要生产适合影院放映的35毫米片子,已经不再生产16毫米的片子了。

精品少,让农民工爱看的电影少。让城市青年叫好的影片不一定能让农民工接受。如果认为农民工总是武打片、枪战片的热衷者,那也是错误的;如果天天给他们灌输早年的传统教育,也起不到理想的效果。

农民工有很大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但其经济条件和消费心理常常阻碍这种需求转变成一种现实消费。在工地上管吃管住,有的农民工贴身衣服口袋里20元整钱能装两个月,舍不得换开,花一元看电影对其来说是很“珍惜”的。而另一方面,有的农民工宁愿花四五元买个烟抽,也不愿掏一元看电影。

王宝生说:“场地不好租,持续开办也需要经济帮助。现有的几个俱乐部的场地都是通过政府协调解决的,我们还想再开办若干个,但一些开发商总是以怕影响施工为由拒绝提供场地。农民工电影俱乐部要想开办好,没有政府、社会的支持是不行的。就拿电影帐篷来说吧,如果买的话,一个2.56万元,单靠电影公司,两年也收不回来成本。一台放映机7000元,数字放映机六七万元,再加上篷内的凳子。一个帐篷使用期也就是两年左右,刮风下雨最容易损坏,要经常维修。天热了,篷内还要通风装电扇,这些都需要投资,但是没钱什么都办不成”。

“一元电影”究竟是该向左走还是该向右走,这个沉重而又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时刻敲打着王宝生和他公司员工。

“一元电影模式”的尴尬嬗变

2007年5月6日这天,对王宝生来说是个痛心的日子,坚守放映了两年的“一元电影”停止了放映。几个放映大棚也从临近的工地上



面对现实王宝生显得很无奈。

撤掉,望着即将消失的放映场地,王宝生内心充满了伤感。

谈起曾经红火的“一元电影”缘何会退出市场,寻求新的经营模式时,王宝生无奈地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随着国家对农民工生存状态越来越关注,各地纷纷出台改善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新举措。在新区,大小建筑工地越来越规范,设立了农民工图书室,配置了电视机和DVD机。农民工们的文化娱乐选择变丰富了,‘一元电影’生意却清淡了”。

就在当时,洛龙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放映设备早已“鸟枪换炮”——国家和省市等部门,先后赠送给他们10台先进的数字电影放映机,比起以前的胶片机效果要好,而且画面更加清晰。

现在,王宝生外出放映使用上了先进的数字电影放映机。虽然音质和图像都比以前的胶片机效果好,但是没以前的“一元电影”放映场面壮观了,并且还要经常流动放映,这给放映人员增添了很多麻烦。最主要的是现在他们不能让设备闲着,响应各级政府的号召,免费送电影到田间地头,义务为社区居民放映电影,参加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王宝生的露天电影放映队重新走回了先前的老路子。

“一元电影”模式的嬗变,使得王宝生和他的团队越来越感到尴尬,他说:“在经济社会,我们搞商业性经营那肯定不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搞公益性放映那肯定不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又不现实。”在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的艰难选择,让王宝生伤透了脑筋。



昔日的辉煌

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azxw@zynews.com

农民工既是工人也是市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曾一度被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如今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新市民”。8月2日,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就明确表示,那些在北京的外来农民工也是北京的市民,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是这座城市活力的一部分。

农民工也是市民,这一称谓与东莞的新莞人,西安、武汉等城市的新市民又更进了一步。虽然专家学者早就呼吁让农民工早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建议取消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号,但作为政府官员,明确地将农民工等同于市民的身份认同,还是令人欣慰。

农民工的称谓经历了“盲流”、“民工”的演变,现在多指那些生活在城市,却不是城市居民的外来务工人员,广义上来说,他们也是工人。然而,因为城乡二元户籍鸿沟的存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始终是个问题。他们来到城市,为城市发展献出汗水和青春,但他们只能暂住在城市里,他们的孩子上学,他们的医疗保障,和城市居民相比,还有着一段距离。

因而,如果说农民工还是一种产业划分上的称谓,那么市民的身份认同纯粹是一种身份上的认同。称谓的改变,伴随的是身份的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比产业工人的定性,内涵自然丰富很多。农民工不止是工人,他们还是市民,这就摒弃了城乡二元思维的传统身份界定,打破了以地域区分身份的固有模式,赋予了亿万多农民工以新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

其实,让农民工转向市民,有很多地方已走出了第一步。从7月13日起,凡在武汉连续务工满3年,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年收入超过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农民工,均可办理武汉城市户口,成为武汉的“新市民”;从8月1日起,深圳以居住证取代已施行24年之久的暂住证,可享受16项服务……新市民也好,居住证也好,尽管有人质疑其只是称谓上的变化,而内容多是换汤不换药,但至少在走向权利平等、身份平等的路上,我们又前进了一步。

称谓之变,折射的是观念之变。与农民工到市民这一称谓上的变化相比,人们在观念上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转变无疑影响更大。只有观念先行,才能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才能进一步拉近农民工与市民的身份距离。

当然,农民工最终能否与市民平等,能否享受市民待遇,还需要将这种观念上的转变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保障上。无可否认,当前的新市民,或持居住证居住的居民,与户籍人口的福利还有差距,在福利待遇上也没有完全纳入城市的公共财政预算中。而且,作为弱势群体,农民工工资被故意拖欠、工时被随意延长、劳保被大幅缩水等情形不时出现。这些都需要我们以制度化的办法来解决,政府有责任出台更多的政策措施,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从盲流到农民工,我们走了30多年。从农民工到市民,但愿不用太长久。 李龙

看谁能扛过谁

在哪个唱哪山的歌,每个人都有他的身份语言。作为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当然会为自己说话,为自己从属的利益集团说话,这很正常。如果他一时很情绪化,说话照三不照四,那一定是被什么东西逼急了。

最近,他这样说,土地的资源使用费快速上涨并居高不下,也大大的推高了房价。于是所有的罪名都扣在了黑心的“开发商”头上,似乎是因为有了开发商才有了高价房。所有人都恨不能打倒黑心的“开发商”,似乎打倒与消灭了黑心的“开发商”,天上就会掉下“廉价房”了。

任志强进一步论证,打倒“开发商”,也不会有“廉价房”。

实际上,黑心开发商不用自己给自己加上引号,打开引号才显示原本的意义。推动土地的资源使用费快速上涨的这只手,与

某些黑心开发商是什么关系,不就是为掠夺民众形成的共谋关系吗?把房价推到天上去,少得了黑心开发商这只强有力的手吗?不是所有人都恨不能打倒黑心开发商,是有着公平和公正诉求的多数人。这个概念不能搞乱搞混。而且,黑心开发商也用不着担心,即使恨得牙痒痒的普通民众用尽办法,也打不倒一个黑心开发商。可以放宽心,现在不是谁想打倒谁就打倒谁的时代。

用经济学的常识说,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它肯定把资金只投向能产生利润的领域,利润越高的领域吸引的投资越多。像任志强所言,投资多,量上去了,价格才能平衡。但是减少一心一意获取暴利的黑心开发商,就会减少了供给量吗?绝不会出现这种危言耸听之事。黑心开发商由于不能获取暴利而退出了房地产市场,那些想

获取合理利润的资本不会紧跟着退出。会有人想盖房子这天吗?不会。房价再降,也不会缺乏想盖房子的开发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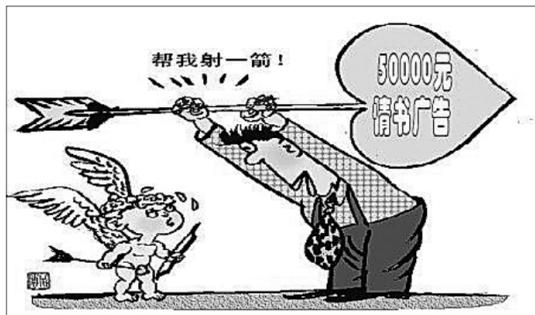
黑心开发商把房价抬高到让人接受不了的程度,就会产生博弈。楼盘在风中晾着,消费者运用自己的选择权,持币观望,看谁的意志更强,看谁能扛过谁。消费者打不倒黑心开发商,黑心开发商会在经济法面前自动倒掉。看任志强急得口不择言的样子,他为啥急?房子卖得快又有持久的暴利可图,他能急吗?到了房地产商们理性回归的某一天,到了市场经济制度愈加完善的某一日,任志强们即使变成“任刚强”、“任超强”,不把“廉价房”的引号打开,也会出现能让广大消费者买得起的便宜房,让消费者不用付出痛苦的代价就能享受得到这基本的民生物品。 今语

漫画:最贵情书

7月30日的《三湘都市报》头版刊登了一封《我比你想象的更爱你》的情书,深情款款的文字配上温馨淡雅的心形图案,表达了男主角“帅”对女主角“盈”“处在崩溃的边缘”的思念之情。记者获悉,由于是在报纸头版刊登广告,男子可谓花了重金,大约为5万元左右。

两个人的感情,就像穿鞋一样,合适不合适,只有两个人知道,硬要将两个人的私事,以广告的形式表达出来,弄得人人皆知,反而不利于“破镜重圆”。

文/林卫萍 图/王成喜



送礼日记暴露的危险潜规则

2007年年底,一份长达数百条的民营企业湘淮公司《请客送礼日记》在网络上曝光,湖南娄底涟源市这家烟花爆竹销售公司8个月内的每日送礼情况展现在世人面前。送礼日记引起了湖南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经娄底市纪委调查,送礼日记基本属实,共查出38名存在问题的涉案人员。《重庆晚报》8月3日

行贿者记录下“请客送礼日记”,是个偶然,在我看来,它的全部意义倒不在于将38名腐败干部绳之以法,而在于暴露了

“不送礼不办事”的潜规则。

“以权谋私”,如果仅仅是个别现象,或可理解;一旦成为普遍“规则”,记入大小企业的“流水账”,这就显得特别可怕。因为,这就意味着腐败已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则人人皆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此中的危害怕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一个民营企业,要想正常运作,竟然要送出去那么多钱,那规模大一些的企业又要送出去多少钱?据7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广东省情调研中心发

布的《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问题分析报告》显示:44%的民营企业反映自己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资精力;高达60%的民营企业家曾因为有关职能部门效率低、办事拖拉、程序繁杂而丧失发展新项目的机遇。

“老问题”却还没有想出新办法:关于权力透明,关于监督到位,关于落实惩罚,如果正于“纸(文件)上谈兵”,则“请客送礼日记”掀起的反腐高潮,很可能也不过是昙花一现,难以根治痼疾。 王军荣

文化如何成了什么都装的大筐

湖北省宜都市国税局一群职员乘车去云南,途中遭遇车祸死亡惨重。事后该局领导说,这些员工是先进工作者,经上级同意去云南考察“税收文化”。有网友说,又一个民间新词“税收文化”诞生了。

中国人的习惯是死者为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之体现。即便这些税务局员工是花公款旅游,和其遭遇的悲剧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多数人不会因此而幸灾乐祸,我们要相信一般人的理性和怜悯之心。何况他们是先进工作者,单位组织去旅游是表彰鼓励先进的一种流行做法,没什么不妥的,没必要非得说是“考察税收文化”,才显示出其正当性。

人是文化的动物,一言一行必有文化的因子,比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而非刀叉,湖北人说话和云南人说话口音有区别,这些都可算文化。这世上有没有“税收文化”?当然有。而且中国的税收文化源远流长,据古籍《周礼》记载,西周时期的政府就有一整套税收制度,大司徒是专司财税户籍的高官,下面有庶人、质人、司稽、泉府、司关等专门的工商税务官员。看上去,文化无所不包,什么行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可是,如果为解释一场偶发事件,非得拉上一张大虎皮,什么事都往文化这个大筐里装,反而容易让公众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被认为是为了掩饰一种心虚。

可是,公众几乎都能明白的道理,身在其中的官员为什么不能?笔者认为,“税收文化”这样的解释其实是中国特色官场人物常见的一种路径依赖,戴上一顶大帽子来表示政治正确,而背后乃一种庸俗的功利计算。

我不相信有关人士说出这句话时,没有想到会引起舆论的质疑。但身在其中,他必须找到这样一个“政治上正确”的说法,只有“政治上正确”了,所有的问题方可顺理成章地解决,比如单位领导的责任问题,死者的丧葬费和家属的抚恤问题,伤者的救治费用问题。而“考察税收文化”这个大筐子虽然可能遭来物议,但舍其已无更合适的了。被舆论讥讽固然不是件好事,但比起在官场内平息矛盾对上对下有个说法,必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的手法可看成官场文化的一种惯性。比如公务员不文明执法引发公民非正常死亡,尸检的结果往往显示死者有心脏病史。这类解释一再再而三地出现,明明知道公众难以相信,但出于官场内的利益计算,这样的套路总是舍弁不,其根本原因和“考察税收文化”的解释相同。

十年砍柴